

愛爾蘭文學的越境想像與福爾摩沙的交會

——以「西來庵事件」的文學表象為中心

吳佩珍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此時期的愛爾蘭獨立運動逐漸蓬勃，藉由推廣愛爾蘭文學運動，喚起了愛爾蘭的民族意識與愛爾蘭民族的文化意識，愛爾蘭開始以獨立為目標邁進，終於在1922年，愛爾蘭獨立終於實現。這群作家矢志發掘愛爾蘭特有的文學·藝術，以愛爾蘭為創作據點，以愛爾蘭（Irish）為文學身分認同進行文學活動。其與殖民地的相關議題——民族主體性與身分認同的主題，自1920年代起便以日本為中心，向周邊地域擴散發酵。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於與愛爾蘭處於同樣處境的日本殖民地：台灣與朝鮮是極大的刺激與鼓舞。

本文主要目的首先將以梁啟超以及林獻堂為中心，探究在「西來庵事件」之前，愛爾蘭經驗如何無獨有偶地對台灣以及梁啟超發生影響，以及愛爾蘭經驗如何激發當時的台灣人對民族運動路線的想像。第二，梁啟超如何藉由日本政治小說《佳人之奇遇》獲取愛爾蘭經驗，接受其民族運動路線的激發與想像的經過，也是本文欲解明的問題之一。第三，透過比較菊池寬的〈暴徒之子〉與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的〈牢獄之門〉，試圖解明愛爾蘭文學的想像如何越境，而菊池寬如何借用愛爾蘭經驗來呈現「西來庵事件」。透過爬梳以上問題，本文主要探究蘊藏於愛爾蘭文學的想像，如何越境與福爾摩沙交會，將以「西來庵事件」為軸，觀察愛爾蘭經驗與台灣主體性二者之間的關聯。

關鍵詞：愛爾蘭文學、西來庵事件、菊池寬、梁啟超、林獻堂

When Irish Literature Encountered Formosa: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Tapani Incident

Wu Pei-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ill the early 20th century, Yeats, Synge, Lady Gregory and others drew on Irish folk tales and songs to add local color to their works. Though it was called the Gaelic Revival, the goal was to build Irish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t worked. Ireland won independence from England in 1922.

The success story of the Gaelic Revival in building a national identity of a colonized people through literary activities that culminated in political independence reached colonized lands in 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rule, in particular Korea and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hed light on how the Gaelic Revival helped buil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To this end, this study discusses two cases: First, Kikuchi Kan's adaptation of Lady Gregory's play to represent the Tapani Incident, which occurred in colonial Taiwan in 1915. Second, Liang Chi-chao's citation of the Irish experience to encourage Taiwanese people, such as the leader of Taiwan's "home rule" movement, Lin Hsien-tang, to create their own "Formosa experience" in print.

Keywords: Irish Literature, the Tapani Incident, Kikuchi Kan, Lin Hsien-tang, Liang Chi-chao

愛爾蘭文學的越境想像與福爾摩沙的交會

——以「西來庵事件」的文學表象為中心

一、序言

眾所皆知，自十二世紀以來，愛爾蘭便受到盎格魯薩克遜英格蘭的支配，直到1922年獨立為止，經歷了英國七百多年的統治。愛爾蘭的「詩人與劇作家之島」美譽，從愛爾蘭裔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先後有W.B.葉慈（W.B.Yeats）、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王爾德（Oscar Wilde）、喬哀思（James Joyce）、貝克特（Samuel Beckett）、奚尼（Seamus Heaney），可見一斑。¹愛爾蘭的獨立運動受到法國二月革命影響，從1850年代開始逐漸成形，由「愛爾蘭共和主義同盟」組織，得到愛爾蘭移民至美國的愛爾蘭裔美國人支持，展開愛爾蘭共和黨兄弟會（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的運動。1879年提出回復土地所有權以及對佃農減租而發生土地戰爭。1916年的復活節蜂起遭到武力的鎮壓，指導者遭到肅清，但也因英勇行為而喚起愛爾蘭人民的愛國心。1919年召開第一回國民會議，宣布獨立，但遭到英國反對而展開鬥爭，直到1922年才脫離英國獲得自治，建立了愛爾蘭自由國。²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此時期的愛爾蘭獨立運動逐漸蓬勃，藉由推廣愛爾蘭文學運動，喚起了愛爾蘭的民族意識與文化意識。愛爾蘭開始以獨立為目標邁進，終於在1922年，獨立終於實現。包括W.B.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約翰·沁孤（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1909），葛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 1852-1932），A.E.（George William Russel, Æ, 1867-1935），喬治·摩爾（George Augustas Moore, 1852-1933），鄧勳尼勳爵（Lord Dunsany, 1878-1957），肖恩·奧凱西（Sean O’Casey, 1880-1964）

1 鈴木暁世，《越境する想像力》（日本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12.02），頁3。

2 鶴岡真弓，〈芥川龍之介の愛蘭土〉，《正論》314号（1998.01），頁133-134。

等，這群作家矢志發掘愛爾蘭特有的文學・藝術，以愛爾蘭為創作據點，以愛爾蘭（Irish）為文學身分認同進行文學活動。其中。他們取材自愛爾蘭的民間故事、民謠、傳統民間故事、神話，探索傳統，透過吸收民眾的風俗與地方風土進入自己的作品，進而在世界的文藝思潮與文學世界中發揮影響力。

愛爾蘭戲劇研究者杉山壽美子指出，「1891年的文學運動承襲了〔民族主義的抬頭〕，1899年興起演劇運動」，被稱為愛爾蘭文藝復興，其最「輝煌的成果、最值得誇耀的遺產」³便是艾比劇場（Abbey Theatre）。1911年至1912年，透過Abbey company在美國以及歐洲各地的公演，愛爾蘭演劇確立了其在國際上的評價。1913年之後，愛爾蘭因勞動爭議導致社會陷入混亂，獨立運動更加激烈，直至1922年愛爾蘭自由國成立為止。⁴

從以上時代背景可知，1912年之後的十年之間，以艾比劇場為中心，帶有濃厚愛爾蘭民族主義色彩的戲劇運動，成為愛爾蘭獨立運動的一環，也加速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推進。艾比劇場也以愛爾蘭獨立運動的一環以及愛爾蘭文學誇耀的文化據點而知名。也因為如此，自十九世紀後半開始，愛爾蘭以及愛爾蘭文學便被視為帶有「反殖民地支配」形象的再現。在這樣國際情勢的推波助瀾下，日本以及當時在其殖民地支配下的台灣、朝鮮，也藉由愛爾蘭文學以及戲劇，受到其「反殖民地支配」思潮的洗禮。

艾比劇場同人的戲曲作品傳播至東亞，其與殖民地的相關議題—民族主體性與身分認同的主題，自1920年代起便以日本為中心，向周邊地域擴散發酵。特別是對於處於與愛爾蘭同樣處境的日本殖民地：台灣與朝鮮；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所提倡的自治・獨立、以及主張克里特民族的民族性與主體性，同時成功地在1922年成立愛爾蘭自由國，是極大的刺激與鼓舞。1920年代，愛爾蘭文學被大量譯介至日本，當時受此文藝思潮影響的朝鮮留學生，返國後紛紛成為推動愛爾蘭戲劇的前鋒。此外，《愛爾蘭文學研究》作者佐藤清1922年赴京城帝國大學英文科任教，其門人以及交遊關係者的白石、柳到真、金祐鎮，之後

3 杉山壽美子，《アベイ・シアター1904-2004：アイルランド演劇運動》（日本東京：研究社，2004.12），頁5。

4 同註3。

都成為愛爾蘭戲劇以及其翻案劇推手。透過愛爾蘭戲曲在朝鮮的上演，當中主張的鄉土色彩、民族主體性與身分認同便自「克里特」（Gelt）民族自動解讀同時轉換為「朝鮮」民族。⁵

相對於韓國，台灣究竟如何回應這一波愛爾蘭的「反殖民支配」的思潮呢？日本統治時期有關愛爾蘭的報導，始自1898年起，便源源不絕地進入台灣。以日本領台時期發行時間最長的日文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為例，有多達六百多件報導，主要均為愛爾蘭獨立運動與英國之間鬥爭的相關報導，也可看出日本統治階層與台灣總督府對愛爾蘭獨立運動的影響力持有高度警戒。台灣武力抗日運動時期以降，1920年文化協會成立，進入台灣社會運動抗日時期，愛爾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從台灣新文學觀察，會發現1930年代之後，愛爾蘭文學與文藝復興運動的相關報導與動向，才在台灣本地的媒體浮出檯面。台灣本地愛爾蘭譯介最重要的推手，為1928年起擔任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教授的矢野峰人（禾積）。1926年至1928年，矢野峰人在台灣總督府援助下，前往英國留學，留學期間前往拜訪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主要作家，如葉慈、葛雷戈里夫人以及AE，也留下會面時的紀錄。⁶事實上矢野峰人就讀第三高等學校時期便開始接觸愛爾蘭文學，之後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英文科就讀，與同樣以引介愛爾蘭戲曲著名的菊池寬為同門，二人師事上田敏與廚川白村。⁷上田敏除了是日本接受愛爾蘭文學的先驅者，也是首位明示「克里特文學」（ケルチック文学）與英國文學不同，屬於獨立存在個體的日本研究者。⁸廚川白村於1904年4月發表的〈英國現代的二詩人〉則為日本第一篇對葉慈以及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本格評論。⁹

矢野峰人在台北帝國大學任教期間，對於愛爾蘭文學的譯介不遺餘力，最具代表者，其在台期間出版了如《愛爾蘭文學史》（1933）以及《愛爾蘭文

5 金杜蘭，「第二章 差異の同一化、同一化の差異——アイルランド劇を「われわれ」のものにする戦略」，〈「われわれ」のアイルランド劇——日本と植民地朝鮮におけるアイルランド文学の移動〉（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研究科博士論文，2008），頁42-61。

6 矢野峰人《片影》中〈イエイツ〉、〈グレゴリイ夫人〉、〈エイ・イイ〉各節。矢野峰人，《片影》（日本東京：研究社，1931）。

7 鈴木暁世，《越境する想像力》，頁89。

8 同註7，頁81。

9 同註7，頁83-84。

藝復興》(1940)等。台灣新文學運動與愛爾蘭文藝復興思潮二者的脈絡關係，從1930年代之後的台灣新文學得以一窺蹊徑。王白淵、吳天賞、張文環所組成的「台灣藝術研究會」，於1930年代初期發行被視為台灣新文學運動起點的《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無論就其研究會名稱的「台灣藝術」還是作品當中強調的「台灣鄉土文學」的概念，與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中的「鄉土藝術」主軸呈現明顯的對照，在當時台灣新文學的各種刊物也能看見愛爾蘭文學被引介的軌跡。¹⁰

本文主要目的如下：首先將以梁啟超以及林獻堂為中心，探究在「西來庵事件」之前，愛爾蘭經驗如何無獨有偶地對台灣以及梁啟超發生影響，以及愛爾蘭經驗如何激發當時的台灣人對民族運動路線的想像。第二，梁啟超如何藉由日本政治小說《佳人之奇遇》獲取愛爾蘭經驗，接受其民族運動路線的激發與想像的經過，也是本文欲解明的問題之一。第三，透過比較菊池寬的〈暴徒之子〉與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的〈牢獄之門〉，試圖解明愛爾蘭文學的想像如何越境，而菊池寬如何借用愛爾蘭經驗來呈現「西來庵事件」。透過爬梳以上問題，本文主要探究蘊藏於愛爾蘭文學的想像，如何越境與福爾摩沙交會，將以「西來庵事件」為軸，觀察愛爾蘭經驗與台灣主體性¹¹二者之間的關聯。

二、愛爾蘭經驗在東亞的傳播——梁啟超與林獻堂的邂逅、以及愛爾蘭「記號」

安東貞美就任台灣總督不久後的1915年，台灣南部發生大規模武力抗日事

10 據筆者調查，愛爾蘭文學在台灣新文學的引介，散見於《先發部隊》、《フォルモサ》、《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文藝台灣》等文學雜誌。愛爾蘭文學與台灣新文學之間的關係，將有待下一階段的調查。

11 「福爾摩沙」原為16世紀大航海時期，葡萄牙水手途經台灣時，發出「Ilha Formosa」的驚嘆，之後成為西洋對台灣的稱呼。參照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翁佳音，〈「福爾摩沙」的由來〉（來源：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25，檢索日期：2017.05.30）。日本殖民地期，台灣在日人統治下對「台灣主體性」的逐漸覺醒，所謂「福爾摩沙」意識型態(Formosa ideology)的萌芽時期為1920-1930年代，基本上便是台灣民族主義的萌芽。參照Rwei-Ren Wu, "The Formosa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Chapter 1.

件。此一事件的重要領導人物為余清芳、羅俊與江定。首謀者余清芳1899年時曾任台南廳巡查補，辭職後便開始出入台南地區的齋堂。之後結識西來庵董事蘇有志與鄭和記後，更頻頻出入西來庵，集結參與反日行動的信眾。羅俊出生於嘉義廳他里霧，1900年參與義民抗日，失敗後前往中國。中途一度回台，但家門丕變，之後再度前往中國以及安南、暹羅等地。1914年台南人陳全發前往廈門，告知羅俊，余清芳密謀革命，羅俊召集有志之士，並於同年12月返台，前往台南會見余清芳，雙方交換推翻日人統治抗日行動意見，並約定羅俊負責台北、台中一帶的工作，由余負責台南一帶的工作。江定歷代定居於台南廳楠梓仙溪里竹頭崎庄隘寮腳，是余清芳最有力的同志。1899年時因擊斃庄民張拉司，遭日本憲兵追捕，後逃亡至山中，經江吉介紹，與余清芳見面，加入余清芳等人的抗日行動。¹²

此一武力蜂起在「西來庵」密謀起事，因而稱為「西來庵事件」，也稱「噍吧哖事件」。余清芳利用宗教宣傳，台灣已經出現「神主」，須建立「大明慈悲國」，驅逐日人。日本警察察覺蜂起事件的首謀為余清芳，發出通緝，余逃入山中。1915年6月29日，羅俊遭到日本警察逮捕。同年7月9日余清芳糾集同志襲擊甲仙埔，7月8日另一路起事者則襲擊噍吧哖附近的派出所。總督府出動軍隊與警察搜山，企圖捕捉余。或明或暗掩護余清芳等起事者的庄民遭到屠殺，史稱「噍吧哖慘案」。1916年4月下旬，江定遭到誘降，下山投降。1916同年8月22日，余遭到逮捕。之後於台南臨時裁判所進行審理，依「匪徒刑罰令」（1898年為懲罰的抗日本統治的「匪徒」而制定的法令），1957人遭告發，1413人遭到起訴，¹³最後866人被判決死刑。由於死刑的判決過度草率，消息馬上便傳至日本「內地」，引起非議。帝國議會內部對這樣的判決結

12 余清芳、羅俊與江定三人生平以及結盟經過。見王詩琅，《余清芳事件全貌——台灣抗日事蹟》（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04），頁131-160。

13 參照王詩琅，《余清芳事件全貌——台灣抗日事蹟》，以及林銜道、程大學主編，《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06），頁1-32，以及康豹，《染血的山谷：日治時期的噍吧哖事件》（台北：三民書局，2006.06）與Paul Katz, *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 The Ta-pa-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余清芳事件全貌——台灣抗日事蹟》與《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的資料出處，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教示。

果，進行了激烈的攻防。¹⁴ 台灣總督府屈服於輿論的壓力，在處置一百多人的死刑之後，便以大正天皇即位的名義，對其餘的「疑犯」進行大赦。¹⁵

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由於規模龐大，死傷慘烈，成為台灣走向非武力抗爭的文化啟蒙社會運動的重要契機。¹⁶ 折射於日本內部對愛爾蘭經驗的鏡像，成為激發台灣對「民族主體性」想像的媒介，而台灣抗日路線的轉換，正成為啟動這波「民族主義」胎動的契機。而此契機，則必須回溯至「西來庵事件」之前。愛爾蘭經驗事實上在「西來庵事件」之前，便曾為在日本統治下對台灣前途感到焦慮的知識分子帶來重要的線索。1920年與蔣渭水等人成立文化協會，主導非武力抗爭的文化社會運動，以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林獻堂，正是其中一人。

林獻堂與愛爾蘭議會鬥爭路線的邂逅，又與當時正亡命日本的梁啟超有關。甲午戰爭後，清廷割讓台澎給日本為其殖民地時，梁啟超與代表上書，反對議和，同時主張台灣不可割讓，這是梁啟超與台灣的淵源起始。¹⁷ 1898年梁啟超因戊戌政變失敗，亡命日本，在橫濱創立《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報刊，提倡「民權主義」、「民族主義」，形成重要的論壇，與清廷政府對抗。亡命日本後的梁啟超，其著作並未受到台灣殖民政府的禁止，在台灣也能流通，林獻堂因而成為梁啟超《清議報》、《新民叢報》的愛讀者。¹⁸

甘得中在〈獻堂先生與同化會〉一文中，追憶「民前二年」，¹⁹ 翁〔林獻堂〕偕舍姪盛昌及余赴日京，某日訪任公先生於橫濱新民叢報館，迄無要領，

14 「西來庵事件」發生當年，第三七帝國議會對此事件進行調查，從台灣人被告在法庭上異口同聲供述山林地調查的疏漏導致山林祖產被沒收，因而認定事件原因為林野問題的處理不當。對於小林勝民議員提出的質問，時任民政長官的下村宏則歸咎於「多數本島人的愚昧」，企圖規避政治責任。參照池田敏雄，〈柳田國男と台湾—西來庵事件をめぐる一〉，国分直一博士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會編，《日本民族文化とその周辺：国分直一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歴史・民族篇》（日本東京：新日本教育図書，1980.10），頁469-470。

15 同註14，頁461-462。

16 康豹，《染血的山谷：日治時期的噶吧嘒事件》，頁122-123。

17 參照黃得時，〈梁任公遊台考〉，《台灣文獻》16卷3期（1965.09），頁4-5；許俊雅，〈論梁啟超辛亥年游臺之影響〉，《社會科學》2007年3期，頁152。

18 葉榮鐘，〈林獻堂與梁啟超〉，《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晨星出版社，2000.07），頁199。

19 黃得時於〈梁任公遊台考〉指出，「民前二年（按「記念集」作五年，二年，係甘氏誤記）」。對照《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載，二人在奈良會晤時間為「明治四十二年」即1909年，本文採用甘得中與《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錄的1909年。

轉往大同學校晤林儒校長，告以來意，林氏謂任公不在這裡，請向神戶同文學校問湯覺頓校長」。²⁰一行之後，在奈良的旅館偶遇梁啟超。林獻堂取出林儒的介紹信，接著向梁啟超傳達台灣當時的情況：²¹

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由無過於愚民教育。²²

對此，梁啟超答曰：

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最好仿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在初期愛人如暴動，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被壓殺無一倖存。後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以與英人分庭抗禮了。……英國漫畫家繪兩位愛爾蘭人，以一條繩索各執一端，將英首相絞殺。這意味著愛人議員在英國席次不多，但處在兩大黨間，舉足輕重，勢固得以左右英內閣之命運。你們何不效之。

林獻堂之後回顧：

我們聞之，妙不可言，自是銘心印腦，繼請先生來臺一遊。²³

由甘得中此記述可知，此次奈良偶遇，乃促成1911年梁啟超赴台拜訪林獻堂的契機。又《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也留下林獻堂與梁啟超在奈良以及之後交遊始末的記錄。「本運動〔指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台中廳直轄阿罩霧庄參事林獻堂（中略）素來渴盼伸張本島人權利，也暗中懷抱企圖促進機運之志，適

20 甘得中，〈獻堂先生與同化會〉，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 卷三 追思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519-520。

21 同註20。

22 同註20，頁520。同時參照黃得時，〈梁任公遊台考〉，《台灣文獻》16卷3期，頁6。

23 同註20，頁520。

在明治42年他於內地觀光之際，在奈良市邂逅支那亡命客梁啟超，聽其說有受其啟發之處。之後二人互相欽慕通信，再隔二年至44年2月下旬，突然接獲梁渡台電報，獻堂立即前往基隆碼頭迎接，伴其至自宅滯留二周。其間梁披瀝己之抱負，引世界亡國埃及、印度、安南等例，大力鼓吹民族主義，據聞獻堂聽之，感銘甚深。」²⁴由上述引文可知，梁啟超給予林獻堂「愛爾蘭經驗」的忠告，不僅是因為當時愛爾蘭的自治路線而讓舉世對英國政局矚目，同時也與愛爾蘭議員透過選舉成功進入國會，開始成為牽制英國國會一股「反撲」的力量有關。²⁵梁啟超自1898年逃亡日本，滯留東瀛近十五載。抵達日本之後，梁啟超在日的支援者主要以犬養毅、大隈重信以及板垣退助等改進黨系的政治家為主。1898年12月日在橫濱創設《清議報》，直到1901年12月發行達一百號。停刊50日之後，1902年2月8日於橫濱創設《新民叢報》直至1907年11月，發行至第96號為止。《清議報》讓梁啟超一躍成為維新派的代表論客，《新民叢報》刊行則讓梁成為轉換中國文明史，進入「近代化」知識的功臣。²⁶1906年9月1日，中國清朝政府發出準備立憲的上諭，進入君主立憲制的階段，政治狀況開始有了激烈的變化。同年10月康有為在美國組織的保皇會，開始進行因應帝國憲政會的改組運動，而梁啟超在1907年10月於東京組織政聞社，獲得三百多人支持者，成為日本進行帝國憲政會改組的奧援，進行開設國會的要求。²⁷

林獻堂與梁啟超在奈良會晤之後，台灣內部的武力蜂起以及總督府對台灣島內的武力鎮壓，依舊持續。1912年的「林圯埔事件」、1913年的「苗栗事件」、1914年的「太魯閣番之役」乃至1915年發生的大規模屠殺、連坐、鎮壓的「西來庵事件」，讓當時台灣人認知日本統治已逐漸穩固，激烈的武力抗日手段已不可行，企圖轉向溫和的文化啟蒙的社會運動路線。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創立之後，以林獻堂以及蔣渭水等成員為中心，自1921年至1934年，展開長

2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第一章文化運動 第二節台灣同化会の成立及消滅〉，《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北：南天書局，1995.06），頁12。此處引文由筆者自譯。

25 以當時《台灣日日新報》為例，如1891年8月11日對愛爾蘭自治案在英國貴族院通過，以及1910年2月愛爾蘭黨在英國國會對於自治案一連串攻防的報導，便可知梁啟超的發言是與愛爾蘭的自治獨立運動風潮，有共時性的關係。

26 參照狹間直樹，〈第2章 思想〉、〈第3章 精神〉，《梁啟超 東アジア文明史の轉換》（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16.04）。

27 同註26，頁183-185。

達15次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企圖讓台灣人透過獲得參政權，以提升台人地位與待遇，可說是走上了與愛爾蘭同樣的議會抗爭路線。²⁸

對1922年成功獲得獨立的愛爾蘭的想像，在1920年代的台灣民族自決運動的動向中，更進一步發揮了影響力。1922年4月發表於《臺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に就て〉（〈關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便以愛爾蘭為例，向總督府陳情其主張。「由於1801年愛爾蘭議會與英國議會併合，結果受到種種不平等的待遇，最後愛爾蘭選出的議員要求組成愛蘭自治黨，之後三十多年來，英國與愛爾蘭之間的難題並未如願獲得解決……在最近，終於成立了予以愛爾蘭自由國完全自治殖民地地位的協定。」²⁹

然而，梁啟超給予林獻堂的忠告，乃至台灣今後面對帝國的抗爭路線，其來自「愛爾蘭經驗」的發想，除了同時代風起雲湧的愛爾蘭獨立運動風潮之外，到底從何而來呢？梁啟超於1911年訪台期間，「引世界亡國埃及、印度、安南等例，大力鼓吹民族主義」，其實正是其在亡命東瀛途中，偶然閱讀的《佳人之奇遇》以「弱小民族」聯合共鬥的核心主旨。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後，同年8月受日本政府庇護亡命至日本的梁啟超，登上日本軍艦大島艦。據同行的王照所言，梁啟超未攜帶任何書籍，因此艦長送給他《佳人之奇遇》，排遣鬱悶。梁啟超邊讀邊翻譯，即在登上軍艦閱讀的同時，便開始著手翻譯。³⁰《佳人之奇遇》全文刊載結束後一年，1898年12月，梁啟超在自己創刊的《清議報》，開始刊載中譯的《佳人之奇遇》（譯名作《佳人奇遇》）。直到第35期，刊載至第12卷中止，之後由矢野龍溪的《經國美談》取而代之。在那之後，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被認為受到《佳人之奇遇》的影響，³¹由此可知，梁啟超亡命當時所閱讀的《佳人之奇遇》給予其深遠影響。1907年梁啟超在神戶旅館給予林獻堂愛爾蘭經驗的建議，可推測部份是得自東海散士《佳人之奇遇》的啟發。

28 葉榮鐘，〈初期台灣議會運動與日總督府態度〉，《台灣人物群像》，頁187-188。

29 臺灣雜誌社編輯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に就て〉，《臺灣》3年1号（1922.04.01），頁40，原文日文，筆者自譯。

30 盧守助，〈梁啟超『佳人之奇遇』及びその周辺〉，《環日本海研究年報》20号（2013.03），頁1。

31 山田敬三，〈『新中國未來記』をめぐって—梁啟超における革命と変革の論理—〉，狹間直樹編，《梁啟超 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11）。

《佳人之奇遇》為明治初期的政治小說，作者為東海散士（柴四朗），自明治18年（1885）初篇刊行，至30年（1897）刊行完畢，共計13年，全篇為8篇16卷，為明治期暢銷的長篇政治小說。³²《佳人之奇遇》以作者東海散士為主人公，描寫其於美國留學期間在費城的獨立鐘邂逅兩名佳人，一為西班牙人幽蘭，一為愛爾蘭人紅蓮，以及清國老志士范卿。幽蘭為西班牙的唐·卡洛斯的黨的支持者，紅蓮則是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擁護者，范卿則為明朝名將翟氏部下的後裔，為支持反清復明的志士。主人公東海散士出身的會津藩，幕末時期遭受薩摩、長州總力攻擊，「國破」人亡。由以上人物設定可知，這是一部強調遭受亡國之恨的弱者之間的連帶與相互扶持，具強烈政治意識形態的小說。其中關於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描寫部分，最主要集中於初篇至二篇。初篇描寫三人相遇之後，各自敘述自己國家的興亡史。第二篇以營救幽蘭之父為主。因幽蘭之父在西班牙遭到逮捕，幽蘭、紅蓮、范卿三人趕往營救。獨自被留下的散士，在紅蓮的介紹下，拜訪愛爾蘭另一位女志士波寧流（パネル）女史，二人的答問中，仔細陳述了英國對愛爾蘭暴政的實況。散士之後接獲波寧流女史過世的消息，前往弔唁。在女史墳前與紅蓮再度相遇，紅蓮敘述如何營救西班牙的幽將軍經過。³³

東海散士為何矚目愛爾蘭問題，除了其本身的幕末親身經歷之外，也因其對國家興衰過程的問題有高度的關心。³⁴此外，東海散士在美留學期間，受教於愛爾蘭出身的經濟學者Henry Carey與Carey的弟子Robert Thompson，因此對於愛爾蘭受到英國嚴苛的政治統治，以及英國強制於愛爾蘭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弊病，有深刻的認識。東海散士對於愛爾蘭出身，主張廢止自由貿易論的議員帕內爾（Charles Stewart Parnell）頗有共鳴，因此在《佳人之奇遇》第二篇，安排另一位愛爾蘭的憂國佳人，這位帕內爾議員之妹波寧流（パネル）女史的登場。³⁵

32 高井多佳子，〈『佳人之奇遇』を読む——小説と現実の「時差」〉，《史窓》58号（2001.02），頁293。

33 同註32，頁295-296。

34 吳叡人，〈「日本」とは何か：試論《佳人之奇遇》中重層的國／族想像〉，黃自進編，《近現代日本社會的蛻變》（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6.12）。

35 同註32，頁293。

由上述梗概可知，《佳人之奇遇》中的愛爾蘭表象主要傳達民族主義、殖民地問題以及主權獨立等政治議題。日本的政治小說原為宣傳自由民權運動為目的而逐漸形成的文類，以宣傳政治目的為優先。梁啟超對於政治改革的高度關心，提倡以文學為手段，企圖對中國政治與社會進行改革之處，可說是深受日本政治小說影響。梁啟超對於小說於國家與政治改革的功用，曾透過〈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強力主張，更具體指出日本維新之所以成功，日本政治小說扮演的角色極具關鍵性。梁啟超對日本的政治小說，曾如此評價：

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間，民權自由之聲，遍滿國中……翻譯既盛，而政治小說之著述亦漸起，如柴東海之《佳人之奇遇》，末廣鐵腸之《花間鶯》、《雪中梅》，藤田鳴鶴之《文明東漸史》，矢野龍溪之《經國美談》……而其浸潤於國民腦質，最有效力者，則《經國美談》、《佳人之奇遇》兩書為最。³⁶

自以上引文可知，梁啟超對《佳人之奇遇》有極高的評價。他是第一位將此小說介紹到中國者，而這部小說也可說是梁啟超滯留日本期間，思想體系開展的出發點。³⁷「西來庵事件」之後，台灣非武裝抗日運動重要的一環，可說是「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主導者之一的林獻堂對於愛爾蘭經驗的援用，是企圖透過「議會設置運動」，達成與愛爾蘭爭取民族獨立成功同樣的結果，而與台灣的民族獨立運動進行連結。伴隨「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來的文化啟蒙運動，在建構「民族想像」時是不可或缺的。透過《佳人之奇遇》，梁啟超強化了對「愛爾蘭經驗」的想像，「愛爾蘭經驗」的想像與援用，成為當時世界弱小民族獨立運動路線的重要指標。1920年代台灣的民族運動路線，也可視為是受此波思潮的觸發，成為「民族主義」萌芽的開端。台灣間接吸取愛爾蘭經驗，以為日本統治下台灣政治運動指標的借鏡。

36 梁啟超，〈飲冰室自由書〉，《清議報》第26冊（1899），引自陳平原、夏小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資料理論1897-1916》第一卷（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02），頁39。

37 盧守助，〈梁啟超說『佳人之奇遇』及びその周辺〉，《環日本海研究年報》20号，頁25。

三、作為觸媒的「西來庵事件」與對殖民地經驗的想像——菊池寬的〈暴徒之子〉與格雷戈里夫人的〈牢獄之門〉

「西來庵事件」在當時日本國內造成的震撼，除了上述小林勝民議員與台灣民政長官下村宏在日本帝國議會的攻防之外，柳田國男生平唯一一次到訪台灣，也與「西來庵事件」有關。柳田國男於1917年3月27日至4月10日期間來到台灣視察，除了因西來庵事件發生當時，台灣總督安東貞美是柳田養家叔父之外，曾任農政長官的柳田國男對於強制徵收林野而引發的「西來庵事件」，極為關心。視察西螺一帶時，當地軍民有志為了歡迎柳田國男的到來，齊聚一堂。柳田則借題發揮，吟詠以「西來菴」為題的和歌：「正因天皇乃神祇，草民悲嘆也無所不知」，借天皇之名，訓誡殖民地台灣的日人，對西來庵事件引發的濫捕與草率判決提出抗議。³⁸ 柳田晚年在其傳記《故鄉七十年》如是回顧：「第一首，不知是台南還是台中，我到訪生蕃叛亂，被大量殺害的西螺鎮時，印象非常強烈。有機會的話，想要談談我感受到的悲傷。」〔吟詠完畢後〕，在場眾人陷入沉默，事實上那正是我的目的。真的非常惶恐，我們人在東京，非常清楚大正天皇絕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正是我吟詠的內容。這也大概是因為我年輕氣盛的關係吧。」³⁹ 之後1930年代普羅文學的全盛時期，伊藤永之介的〈總督府模範竹林〉再次聚焦山林徵收問題與「西來庵事件」，作為普羅文學的創作題材。⁴⁰

愛爾蘭文學傳入日本境內時，「西來庵事件」意外成為其對愛爾蘭文學「反殖民地支配」想像的重要觸媒。菊池寬於1916年2月《新思潮》創刊號發表了戲曲〈暴徒之子〉，此雜誌同人久米正雄在此2月號的〈編後記〉中如此

38 此和歌原文如下：「西來菴 大君はかみにしませば民草のかかる嘆きも知るしめすらし」。柳田國男訪台期間，以參訪的各地為題，留下了八首和歌，分別題為「日月潭」、「霧社歸途」、「濁水溪」、「阿緱」、「打狗」（二首）、「再（西）來菴」、「含笑花」。參照柳田國男，〈南遊詠草〉，《台灣日日新報》，1917.04.08，7版。

39 柳田國男，〈故鄉七十年〉，岡谷公二編，《柳田國男》（日本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8.04），頁222。關於柳田國男將西來庵發生地點誤記為西螺以及此事件為生蕃叛亂一事，池田敏雄在〈柳田國男と台灣—西來庵事件をめぐる一〉已有詳述。同時參照池田敏雄，〈柳田國男と台灣—西來庵事件をめぐる一〉，国分直一博士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會編，《日本民族文化とその周辺：国分直一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歴史・民族篇》。

40 伊藤永之介的〈總督府模範竹林〉，《文藝戰線》7卷11號（1930.11），後收入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 別卷》（日本東京：綠蔭書房，1998.07）。

聲明：「草田⁴¹與原稿一起寄來的信中寫道：不想被人認為這部戲曲是得自武者小路氏的〈商談〉的構思，特此敬告。」⁴²那麼武者小路實篤的〈商談〉（ある相談）到底是甚麼樣的內容，為何菊池寬要特地說明：「不想被人認為這部戲曲是得自武者小路氏的〈商談〉的構思」呢？

武者小路實篤的戲曲〈商談〉發表於1916年1月的《中央公論》，內容是由甲、乙、丙三人的對話所構成。開場如下：⁴³

「從前，在某個國家，曾有個就人的性命討論的商談會，如下。三人不斷地抽著菸。」（頁247）。

三人就是否該判誰死刑，互相商量。「這如果是同一國人就麻煩了，因為對象是土人，就簡單了。」（頁248）。

「罪名全都定成同一個好了。反正是土人，應該沒有人會囉嗦吧。」（頁250）

「因為都是些只要逮到機會就想造反的傢伙呀，不過這也是沒辦法，畢竟忍受不了成為亡國之民嘛。」（頁250-251）。

從發表時間點以及內容來看，顯然便是以1915年發生於殖民地台灣南部的「西來庵（礁吧岬）事件」為藍本。首先對「西來庵事件」的鎮壓與判決提出質問與抗議的日人作家，便是武者小路實篤。受初期社會主義影響，人道主義氣息濃厚的武者小路，所發表的1915年11月號《白樺》中的〈六號雜記〉、評論〈八百人的死刑〉、〈編輯室報告〉以及1916年1月的《中央公論》的〈商談〉，是他針對「西來庵事件」一連串的批判與叩問。從上述引文，我們可以發現武者小路實篤對於殖民地官僚針對參與蜂起者以及被捲入事件的無辜者進行一視同仁的死刑判決，發出的嘲弄與諷刺。此外，在〈商談〉之前，武者小路已經發表了對日本統治層的抗議文〈八百人的死刑〉（《白樺》1915年

41 菊池比呂志、草田杜太郎為菊池寬筆名，〈暴徒之子〉的作者署名為草田杜太郎。

42 新思潮同人，〈編集後に〉，《新思潮》（第四次）創刊号（1916.02），頁78-79。

43 武者小路實篤，〈ある相談〉，《中央公論》31卷1号（1916.01）。引用此出處時，直接於文後標記頁碼。

10月)。武者小路實篤一連串針對西來庵事件的反響中，〈商談〉顯然是基於這個事件的即時戲曲創作，同時帶有針對性的批判意識。

由久米正雄的〈編後記〉可知，菊池寬不想讓人認為〈暴徒之子〉是來自武者小路實篤的影響，但也間接承認了〈暴徒之子〉是以「西來庵事件」為主題的作品。由〈暴徒之子〉的描寫開端，隨即便能連想當時在日本帝國議會掀起激烈攻防的「西來庵事件」：「就在某國新領土上，本國人進行燒打虐殺不久後，發生慘事的一個村莊……」如果如菊池寬所述，〈暴徒之子〉的靈感並非得自武者小路實篤的〈商談〉，那麼，菊池寬透過〈暴徒之子〉，想要描摹出什麼樣的「西來庵事件」形象呢？同時，為何以戲曲形式的〈暴徒之子〉來呈現「西來庵事件」呢？

菊池寬參加第四次《新思潮》運動之初，⁴⁴ 其投稿同時被接受刊登的，幾乎都是戲曲作品，這些作品均受到愛爾蘭戲曲不少的影響。⁴⁵ 根據菊池寬的自述傳記〈半自述傳〉可知，他自1913年9月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英文科之後，直到1916年畢業為止，全力投入愛爾蘭戲曲的研究。從其畢業論文《英國及愛爾蘭近代劇》（英国及び愛蘭の近代劇）便能得知，其受到愛爾蘭戲劇極深的影響。先行研究中，片山宏行指出，〈暴徒之子〉是受了活躍於艾比劇場（Abbey Theatre）的劇作家，同時有愛爾蘭演劇之母美稱的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的〈牢獄之門〉（*The Goal Gate*）（1906年）的影響。⁴⁶

關於菊池寬的〈暴徒之子〉與〈牢獄之門〉之間的互文關係，片山宏行指出，從二作的人物設定、主題來看，相似性極高。此外，片山還指出，〈暴徒之子〉中菊池寬對「斗篷事件」「苦惱的投射，恐怕是讀了〈牢獄之門〉的菊池寬，對於堅持不吐露夥伴的罪狀，因而喪生的丹尼斯·卡爾（Denis Cahel），與不願告發佐野文夫的竊盜罪，因此蒙受不白之冤而從一高退學的自己，二者

44 《新思潮》為日本明治・大正期的代表性文藝雜誌，發刊、停刊之後再發行，前後共計五次。菊池寬所參與的第四次新思潮，發行期間為1916年2月至1917年3月，此次參與成員包含芥川龍之介、菊池寬、久米正雄、松岡讓（ゆずる）、成瀬正一（せいいち）五名。刊載作品包括芥川受到夏目漱石激賞的〈鼻〉，以及菊池寬膾炙人口的戲曲《父親歸來》。參照「新思潮」，日本大百科全書（ニッポニカ），Japan Knowledge（來源：<https://japanknowledge.com/>，檢索日期：2016.07.18）。

45 河野賢司，〈菊池寬とアイルランド演劇〉，《エール》17号（1997.02），頁46-47。

46 片山宏行，〈菊池寬の航跡—初期文学精神の展開〉（日本東京：和泉書院，1997.09），頁213-218。

應該有著重疊的印象。」⁴⁷相對於此，格清久美子持不同意見，認為「讀了以殖民地真實事件為主題的〈牢獄之門〉與〈商談〉，作者為在台灣發生的事件所觸發而創作，這樣的想法不是很自然嗎？」⁴⁸金牡蘭則指出「從菊池寬關於〈商談〉的發言來看，不僅對危及〈暴徒之子〉獨創性懷抱著不安，對於在〈暴徒之子〉中的殖民地，是透過〈商談〉與〈八百人的死刑〉形式，被具體指出是發生於台灣的事件，也感到不安。」⁴⁹

如果從台灣的殖民地統治與「西來庵事件」的歷史事實來檢證的話，以上三者的論點都有推敲的餘地。關於創作的動機，片山以「個人史」視點評價菊池寬這個作品，忽略了來自同時期殖民地發生蜂起事件的影響，對此作品的格局有過小評價之嫌。格清久美子則認為此作主題是「原住民族的抵抗」，「比起當時的社會主義者，〔菊池寬〕確切地看穿了以愛爾蘭戲曲的主題所確立的殖民地民眾的民族意識，以及對獨立的希求」。格清對此作的越境性以及菊池寬對於帝國在殖民地統治實況的掌握有一定評價，但從以上論述，顯然對於這起事件以及台灣殖民地當時狀況並未充分掌握，對殖民地的認識顯得一元化。

〈暴徒之子〉對於台灣內部的族群描寫，菊池寬區分為「原住民（＝ちいほあん）」、「漢民族（＝土人）」，顯然對於此事件的掌握並非為「原住民族的抵抗」，對當時台灣族群分布狀況，顯見有一定程度的掌握。金牡蘭的「不僅對危及〈暴徒之子〉獨創性懷抱著不安……被具體指出是發生於台灣的事件也感到不安」的觀點則有對於「西來庵事件」發生當時，日本媒體對此事件的矚目度與認知度過小評價之嫌。以《朝日新聞》為例來看的話，蜂起發生後，從1915年7月19日「台灣獨立的陰謀 暴徒蜂起虐殺六名警官、五名內地人」的報導開始，到同年10月28日為止，共有17件報導。〈暴徒之子〉發表於1916年2月的《新思潮》之後，即使劇評也如此指出：「所描寫的台灣的暴徒之子、他的母親以及他的妻子中，母親是最活躍的。總體而言是平凡之作，但

47 同註46。

48 格清久美子，〈菊池寬とアイルランド文学—『暴徒の子』における植民地の表象をめぐる—〉，《近代文学研究》17号（2000.02），頁23。

49 金牡蘭，〈「暴徒の子」が物語るもの—菊池寬とアイルランド文学の思考に向けて—〉，《比較文學》49卷（2007.03），頁43。

確有打動人的熱情」。⁵⁰ 從以上引文可知，當時讀者對菊池寬〈暴徒之子〉舞台的認知，毫無疑問是台灣。

我們如果重新閱讀菊池寬的〈暴徒之子〉與格雷戈里夫人的〈牢獄之門〉，同時進行比較分析的話，便能明白二者主題的異同。

菊池寬〈暴徒之子〉為一幕劇，⁵¹ 登場人物有主人公壽春為17、8歲的少年，壽春的妻子為18、9歲的少女，以及年過60的母親，以及某名男子。內容描述在某個村莊，由「本國人」引發暴動，主人公壽春的父親參與暴動，同時加入放火的行列，因為父親「只要看見那個國家的人們，便露出如蛇一般的目光，因為他的兩個兄弟都被〔他們〕絞殺」了。壽春擔心父親的身體，跟隨在後，雖然並無參與實際暴動，但仍遭到逮捕。因為「那個國家的人們根本分不清那個孩子與其他人，因為一說到土人，他們認為都一樣。」此外，一起被捕的本國人們，認為只要沒人對暴動的真相吐實，「對方也無計可施」（頁23）。殖民官僚跟壽春說，要是他據實以告，便能獲得無罪釋放。一開始，壽春堅不吐實，但見到瀕臨死亡的父親為了乞討水喝，十分痛苦的樣子，於心不忍，「就算是背叛了世界所有人，也想給他水」（頁30），於是便坦白招供了。喝了水之後，父親仍然去世了，但壽春獲釋了。由於壽春招供的事實，為村人所知，最後被來到他們家門的男子帶走，「或許會被沉到河裡吧」。

從以上的描寫可知，在「新領地」引發暴動的村人，各自有不同的立場。壽春的父親，「因為他的兩個兄弟都被〔他們〕絞殺」了，被認為參與蜂起也無可厚非。然而母親眼中的壽春，「〔對此事〕一無所知，同時一點也不憎恨那個國家的人，也受到郵局的人們的疼愛」（頁24），要是被殺了，未免太可憐。但壽春母親的態度，在壽春被釋放的之前與之後變化，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當壽春的妻子說到要是他不招供，應該能平安無事吧，此時他的母親舉壽春死去的哥哥的主張為例：「那個國家的人，就算不清楚有罪無罪，只要能好好給予懲罰就行了。土人殺了那些人時，為了殺雞儆猴，只要能處決人就

50 青頭巾，〈讀んだもの〉，《新潮》24卷4号（1916.04），頁34-35。底線為筆者所加。

51 菊池寬，〈暴徒之子〉，《新思潮》（第四次）創刊号（1916.02），頁22-33。引自此出處者，直接於文末標記頁碼。

行。」（頁23）。然而，卻在聽到壽春被釋放時，對「那個國家的人」的態度完全改變了：「那個國家的人比村子裡的人還要聰明上十倍，他們跟神一樣，完全清楚壽春甚麼都沒做。因此，我不認為我像村子裡的人一樣，憎恨那個國家的人呢。我們被那樣伶俐善巧的人統治，也是理所當然的呢。」（頁26）。

圍繞著暴動事件，藉由被殖民者的種種反應，可看出殖民地政策在此殖民地發生的作用與變化。由於兄弟遭殖民者殺害，有參與暴動必然動機的父親、對殖民者不抱持反抗意識的年輕世代——壽春、以及逐漸馴服於殖民者統治的母親，三者的形象顯示，成為日本「新領地」已經過20年的台灣人民與殖民政權關係的力學構圖。對於殖民政權依舊採取反抗態度的父親，可說是「西來庵事件」反抗者的表象。代表日本殖民政權君臨台灣之後的壽春的世代，因此「一無所知」，「根本不憎恨那個國家的人」。最後，代表已馴服於這個統治政權的庶民者，是壽春的母親。深知殖民政權殘酷的一面，即使如此卻也逐漸屈從於殖民統治，同時企圖依附殖民權力來確保身家安全。這樣的權力結構，在終結部分可清楚看出。

當壽春招供因而獲得無罪釋放的事為人所知後，村中某位男性上門企圖將他帶走時，壽春知道自己即將遭到殺害，從藏匿處走了出來。壽春的母親發了狂似地大喊：「你要想殺了壽春，你就試試吧。我會拜託城鎮的官僚將這村中的人全部殺死。」（頁32）對此，男子回應：「他們對於土人殺了他們的人的話，當然不善罷甘休，但土人之間無論發生何事，根本不放在心上。」（頁33），緊接著帶走了壽春。老母親異常憤怒，發誓要借殖民者之手復仇，如此詛咒：「混帳！居然讓最老實的人遭遇最慘的待遇！無論是村裡的還是鎮上的人，都去死吧！」（頁33）

〈暴徒之子〉中呈現的，是殖民政權帶給被殖民者內部的分裂與對立的構圖。這個結構能夠被解讀為殖民者統治逐漸進入安定期的同時，被殖民者所行的反抗則充滿著「敗北」的無力感與虛無感，「密告」與否的議題，讓被殖民者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隨之昇高，除了揭露殖民者的分離統治政策的真相，也讓被殖民者不過是徹底的「敗者」的表象，赤裸裸呈現。

相對於〈暴徒之子〉，被認為影響〈暴徒之子〉，描寫受到英國殖民地暴

政迫害的愛爾農民的〈牢獄之門〉是如何形塑被殖民者呢？〈牢獄之門〉為格雷戈里夫人於1906年8月所創作的一幕劇，是根據愛爾蘭農民的真實的蜂起事件所改編。

菊池寬個人在與山本修二合著的《英國·愛蘭近代劇精髓》中，對此作如是評價：「總感覺此劇的實感並未提高至悲劇美，不過徒然充滿慘淡的氛圍，不能說是傑作。」⁵²與〈暴徒之子〉相比，〈牢獄之門〉中被殖民者的情感與憤怒，的確有被「愛爾蘭民族主義」完全回收的傾向。也因為如此，人物內面的描寫，有流於平板的缺陷。登場人物有丹尼斯·卡爾（Denis Cahel）的母親瑪麗·卡爾（Mary Cahel）以及妻子瑪麗·辜辛（Mary Cushin）以及看門的獄卒。故事敘述丹尼斯的村莊，有官吏遭受襲擊，丹尼斯也被當成嫌犯遭到逮捕。不久之後其母親與妻子接到來信，認為丹尼斯可能被釋放，同時村中盛傳丹尼斯因為密告一同被捕的友人，所以才能獲得釋放。妻子與母親從黑夜走到黎明，來到牢獄門前。因為二人是目不識丁的農婦，不知信中內容，看守牢獄大門的獄卒代讀之後，告知她們，丹尼斯昨日已經被處以絞刑死亡，⁵³因為「當局」發現他在窗外的腳印，而他的村人同伴則因為證據不足獲釋。他的母親得知他並未背叛同伴，對於他被處刑覺得驕傲。在最後，高喊著：「就算過了五十年，我的腰已經彎到必須倚仗拐杖，我依舊不厭倦讚美他。來，瑪麗·辜辛，妳就在沿路上高喊：丹尼斯·卡爾為了鄰人而死！」⁵⁴

〈牢獄之門〉首次被介紹至日本，也是在《新思潮》。屬於第一次新思潮同人的小山內薰，轉載英國當地報紙*The Stage*，介紹1907年6月10日起，都柏林艾比劇場的國民演劇協會在倫敦的Great Queen Street劇場進行為時一周的愛爾蘭戲劇的公演。〈牢獄之門〉於同年6月12日上映，*The Stage*對此劇評價為：「淒慘的愛爾蘭式悲劇，有力驚悚，的確成功地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此劇乃

52 菊池寬、山本修二，《英國·愛蘭近代劇精髓》（日本東京：新潮社，1925.09），頁212。

53 〈牢獄之門〉梗概，參照“The Goal Gate Analysis”（來源：<http://www.enotes.com/topics/goal-gate/in-depth>，檢索日期：2016.07.21）。

54 Elizabeth Coxhead, “The Goal Gate,” *Lady Gregory: Selected Play* (Canada: Maclean-Hunter Press, 1972), p.105.

根據愛爾蘭屢屢發生的事實，忠實描寫。」⁵⁵

1906年8月完成的〈牢獄之門〉，所謂「根據在愛爾蘭屢屢發生的事實，忠實描寫」，其實便是因1879年愛爾蘭佃農組織了「土地同盟」以對抗地主而爆發的土地戰爭（Land War, 1879-1882）。在此抗爭過程中，英國統治愛爾蘭期間的19世紀到20世紀初，愛爾蘭農村社會的密告頻繁發生，因為地主與佃農之間的糾紛頻傳，槍擊事件也並不稀奇。同時也因為這樣的殖民地背景，醞釀出密告者被視作叛徒的風土，因此產生如〈牢獄之門〉的悲劇。⁵⁶此劇的宣傳要素確實濃厚，同時充滿喚起「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意識形態。但作者格雷戈里夫人本人曾明言：「是此卷中〔按：指自己的戲曲選集〕最鍾愛作品之一，從未變動過一個字。」⁵⁷曾經說過自己是「是為了帶給愛爾蘭尊嚴而寫」，⁵⁸她深愛此劇的原因之一，是因其透過寫實手法確切地描摹因英國殖民統治所苦的愛爾蘭農民，喚起同時企圖建構「愛爾蘭民族主義」。

從〈牢獄之門〉以上的梗概，我們能清楚看出其劇中人物以及敘事結構給予〈暴徒之子〉強烈的影響，〈暴徒之子〉與〈牢獄之門〉的結構有極高的雷同性。菊池寬的〈暴徒之子〉發表之後，曾二度收錄於單行本，一為1919年的《心之王國》，⁵⁹一為1922年的《日本近代戲曲集》，可知菊池寬對此作品的珍視。之後於1922年5月改題為〈背叛〉（裏切），由歌舞伎演員中村歌右衛門一門於新富座上演。此劇上演之後的劇評如下：「呈現成為日本領土不久之後的台灣，某個土人家中內部的舞台。灰色的牆壁，點上了陰暗的魚油燈，這室內似乎漂盪著慘淡的氛圍」。⁶⁰從前述引文可知，〈暴徒之子〉（〈背叛〉）是根據殖民地台灣的「西來庵事件」所改編的戲曲，對於當時的讀者

55 ゼ・ステージ（KO生），〈倫敦における愛爾蘭劇〉，《新思潮》（第一次）第一号（1907.10），頁41-55。

56 杉山寿美子，《アベイ・シアター1904-2004：アイルランド演劇運動》，頁150-151。

57 Rwei-Ren Wu, "The Formosa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Chapter 1., p. 106.

58 吳潛誠，〈愛爾蘭啟示〉，《航向愛爾蘭：葉慈與塞爾特想像》（台北：立緒出版社，1999.04），頁37。

59 菊池寬，《心の王国》（日本東京：新潮社，1919.01）。《心之王國》的書名酷似葉慈於1894年發表的戲曲《心願之國》（*The Land's of Heart's Desire*），可視為是菊池寬對葉慈致敬的命名。

60 〈五月の芝居『孤城落月』と『裏切』（下）〉，《読売新聞》（1922.05.10），7版。文中底線為作者所加。

（或是觀眾）而言，可說有一種共時性的認識。然而，為何菊池寬表示不想讓人認為〈暴徒之子〉是受了武者小路實篤〈商談〉的影響呢？

事實上，〈暴徒之子〉創作的契機，是由於第一次投稿《新潮》創刊號的戲曲〈藤十郎之戀〉被退稿的關係。退稿是「新潮」同人芥川龍之介、久米正雄等做出的決定。被退稿之後，在極短的時間內能夠寫出旨趣與《藤十郎之戀》完全不同的〈暴徒之子〉，是因為發生於殖民地台灣的「西來庵事件」正宛如於英國殖民統治下的愛爾蘭農民蜂起吧？也因為如此，才得以翻案自格雷戈里夫人的〈牢獄之門〉吧？此外，菊池寬不想讓人認為〈暴徒之子〉是受到武者小路實篤〈商談〉的影響，除了菊池寬不單單描寫「西來庵事件」，同時也因為其自負能呈現一種處於殖民地統治下人們的普遍性。

菊池寬以〈牢獄之門〉的愛爾蘭殖民地實際事件為藍本，以「西來庵事件」為媒介，試圖轉換〈暴徒之子〉成為台灣殖民地經驗的戲曲，其中對殖民地官僚以及殖民統治的蠻橫與暴虐的批判與諷刺，此外，聚焦於被殖民者對殖民統治者情感上的矛盾與愛憎交錯，讓被殖民者重層複雜的面貌清楚浮現。格雷戈里夫人透過真實的農民暴動事件，企圖建構同時召喚出〈愛爾蘭民族主義〉的結局，〈牢獄之門〉所呈現的對民族的共同想像，也是格雷戈里夫人召喚出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菊池寬的〈暴徒之子〉，對於愛爾蘭殖民經驗的援用與想像，與同時代台灣殖民地經驗的實際情況則有極大的隔閡。這也是殖民者對於當時台灣殖民地統治現實理解的侷限，並無法洞察「西來庵事件」蜂起者心中的渴求——希望得以擺脫殖民者無理的徵課與不平等的統治。在殖民地台灣，與格雷戈里夫人召喚出的「愛爾蘭民族主義」同質性的「福爾摩沙意識形態」的萌芽，則須等待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下一波民族運動的到來。

四、結語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藉由推廣愛爾蘭文學運動，喚起了愛爾蘭的民族意識與愛爾蘭民族的文化意識，愛爾蘭開始以獨立為目標邁進，終於在1922年實現獨立。W.B.葉慈、約翰·沁孤、格雷戈里夫人等作家矢志發掘愛爾蘭特有的文學、藝術，以愛爾蘭為創作據點，以愛爾蘭為文學身分認同進行

文學活動。他們取材自愛爾蘭的民間故事、民謠、傳統民間故事、神話，探索傳統，透過吸收民眾的風俗與地方風土進入自己的作品，進而在世界的文藝思潮與文學世界中發揮影響力。除了推展愛爾蘭戲劇運動的同時，也為愛爾蘭文學帶來了文藝復興，對於愛爾蘭的民族獨立運動以及國家獨立有極大的貢獻，同時激發對於愛爾蘭民族建構的想像。

這個愛爾蘭經驗傳播至東亞時，日本、韓國與台灣都受到深遠的影響。對於與愛爾蘭同樣受到殖民統治的台灣而言，可說是渴望著透過文化、文學這樣的非武力手段，凝結「克里特」（Gelt）民族的共同想像，最後獨立成功的愛爾蘭經驗吧。進入1920年代，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台灣，在摸索非武力抗爭的民族運動路線時，愛爾蘭經驗的想像與借鏡，也在台灣發生了影響力。「西來庵事件」的慘烈屠殺與鎮壓，為台灣民族運動路線帶來了顯著的變化。林獻堂將如此的愛爾蘭經驗的想像，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連結。

1933年7月於東京創刊的《フォルモサ》（福爾摩沙）發刊詞，曾發出這樣的疑問：「台灣有固有的文化文藝嗎？又，現在有嗎？」對於這樣的疑問，作者自問自答：「台灣人有了不起的文化遺產」，同時矢志將「整理研究一直以來消極微弱的文藝作品與目前膾炙民間的歌謠與傳說等鄉土藝術，積極地以吾人的全副精神創作真正的台灣純文藝。」⁶¹ 第二號吳坤煌〈論台灣的鄉土文學〉⁶² 更是沿襲發刊詞中如何呈現台灣鄉土的這個關鍵詞。其中對於台灣文學與文化的主體性想像，以及企圖回復「固有」的鄉土藝術的意圖，與愛爾蘭文藝復興對克里特民族主體性以及文學與文化的復興主張，可說是不謀而合。在這樣的「民族文化」論述形成過程中，「鄉土文學論戰」的論述形成也可見與愛爾蘭文藝復興論爭的共通點。例如，在愛爾蘭文藝復興中，有主張應該以蓋爾語（Gaelic）來取代英語，但當時大多數的愛爾蘭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以蓋爾語創作的的能力。但以英語真無法表現愛爾蘭民族精神嗎？事實上，以英詩歌頌愛爾蘭民族精神的葉慈（W.B. Yeats），於愛爾蘭獨立第二年的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便是最好的證明。

61 フォルモサ編集部，〈創刊の辞〉，《フォルモサ》1期（1933.07），頁1。

62 吳坤煌，〈台灣の郷土文学を論ず〉，《フォルモサ》2期（1933.12），頁8-10。

台灣也同樣地，在經歷「台灣話文」等論爭之後，日語世代的作家登場，紛紛以日語創作富有「福爾摩沙」鄉土特色的作品，登上日本文壇。例如膾炙人口的楊逵的〈新聞配達夫〉（送報伙）（1934）與呂赫若的〈牛車〉（1935）。當時的台灣作家以殖民者的語言書寫台灣時，其心中或許正描摹未來的福爾摩沙的形象，正如同葉慈那首〈給未來時光的愛爾蘭〉（To Ireland in the Coming Times）般。

Know, that I would accounted be
True Brother of a company
That sang, to sweeten Ireland's wrong,
Ballad and story, ran and song.

知道，我會被列為
那些人真正的兄弟
他們詠唱民謠和故事，詩和歌曲。
把愛爾蘭的冤錯化為甜美。⁶³



63 吳潛誠，〈航向愛爾蘭：葉慈與塞爾特想像〉，頁27。

參考資料

一、專書

片山宏行，《菊池寛の航跡——初期文学精神の展開》（日本東京：和泉書院，1997.09）。

王詩琅，《余清芳事件全貌——台灣抗日事蹟》（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04）。

矢野峰人，《片影》（日本東京：研究社，1931）。

吳潛誠，《航向愛爾蘭：葉慈與塞爾特想像》（台北：立緒出版社，1999.04）。

杉山寿美子，《アベイ・シアター1904-2004：アイルランド演劇運動》（日本東京：研究社，2004.12）。

国分直一博士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会編，《日本民族文化とその周辺：国分直一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歴史・民族篇》（日本東京：新日本教育図書，1980.10）。

岡谷公二編，《柳田國男》（日本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8.04）。

林衡道、程大學主編，《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第一輯第一冊（台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4.06）。

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 卷三 追思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河原功編，《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日本人作家作品集 別卷》（日本東京：綠蔭書房，1998.07）。

狹間直樹，《梁啟超 東アジア文明史の転換》（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16.04）。
——編，《梁啟超 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11）。

康豹，《染血的山谷：日治時期的噍吧哖事件》（台北：三民書局，2006.06）。

陳平原、夏小紅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資料理論1897-1916》第一卷（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02）。

菊池寛，《心の王国》（日本東京：新潮社，1919.01）。

菊池寛、山本修二著，《英国・愛蘭近代劇精髓》（日本東京：新潮社，1925.09）。

黃自進編，《近現代日本社會的蛻變》（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6.12）。

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晨星出版社，2000.07）。

- 鈴木暁世，《越境する想像力》（日本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12.02）。
-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北：南天書局，1995.06）。
- Elizabeth Coxhead ed., *Lady Gregory: Selected Play* (Canada: Maclean-Hunter Press, 1972).
- Paul Katz, *When valleys Turned Blood Red: The Ta-pa-ni Incident in Colonial Taiwan*.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フォルモサ編集部，〈創刊の辞〉，《フォルモサ》1期（1933.07），頁1。
- ゼ・ステージ（KO生），〈倫敦における愛爾蘭劇〉，《新思潮》（第一次）第一号（1907.10），頁41-55。
- 吳坤煌，〈台湾の郷土文学を論ず〉，《フォルモサ》2期（1933.12），頁8-19。
- 武者小路實篤，〈ある相談〉，《中央公論》31卷1号（1916.01），頁247-255。
- 河野賢司，〈菊池寛とアイルランド演劇〉，《エール》17号（1997.02），頁43-55。
- 金牡丹，〈「暴徒の子」が物語るもの—菊池寛とアイルランド文学の思考に向けて—〉，《比較文學》49卷（2007.03），頁35-51。
- 青頭巾，〈読んだもの〉，《新潮》24卷4号（1916.04），頁34-35。
- 格清久美子，〈菊池寛とアイルランド文学—『暴徒の子』における植民地の表象をめぐって—〉，《近代文学研究》17号（2000.02），頁22-35。
- 高井多佳子，〈『佳人之奇遇』を読む——小説と現実の「時差」〉，《史窓》58号（2001.02），頁293-306。
- 許俊雅，〈論梁啟超辛亥年游臺之影響〉，《社會科學》2007年3期，頁152-163。
- 菊池寛，〈暴徒之子〉，《新思潮》（第四次）創刊号（1916.02），頁22-33。
- 黃得時，〈梁任公遊台考〉，《台灣文獻》16卷3期（1965.09），頁1-61。
- 新思潮同人，〈編集後に〉，《新思潮》（第四次）創刊号（1916.02），頁78-79。
- 臺灣雜誌社編輯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に就て〉，《臺灣》3年1号（1922.04），頁40。
- 盧守助，〈梁啟超訳『佳人之奇遇』及びその周辺〉，《環日本海研究年報》20号

(2013.03)，頁1-28。

鶴岡真弓，〈芥川龍之介の愛蘭土〉，《正論》314号（1998.01），頁133-134。

（二）學位論文

金牡蘭，〈「われわれ」のアイランド劇——日本と植民地朝鮮におけるアイランド文学の〈移動〉〉（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研究科博士論文，2008）。

Rwei-Ren Wu, “The Formosa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三、報紙文章

〈五月の芝居『孤城落月』と『裏切』（下）〉，《読売新聞》，1922.05.10，7版。

柳田國男，〈南遊詠草〉，《台灣日日新報》，1917.04.08，7版。

四、電子媒體

〈牢獄之門〉梗概，參照“The Goal Gate Analysis”（來源：<http://www.enotes.com/topics/gaol-gate/in-depth>，檢索日期：2016.07.21）。

「新思潮」，日本大百科全書（ニッポニカ），Japan Knowledge（來源：<https://japanknowledge.com/>，檢索日期：2016.07.18）。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翁佳音，〈「福爾摩沙」的由來〉（來源：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25，檢索日期：2017.05.30）。